

李怀宇



思想人

当代文化二十家

余英时 金耀基 李欧梵 陈平原 何莫邪 刘荒田 吴中杰 李辉 刘绪贻 吴灏
吴宏一 潘耀明 蔡澜 陶杰 也斯 夏伯嘉 董启章 杨锦麟 梁文道 周保松

漓江出版社



李怀宇

思想人

当代文化二十家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人/李怀宇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407-5848-6

I. ①思… II. ①李… III. ①名人—访谈录—中国—现代 IV. ①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2160 号

策划组稿:郑纳新

责任编辑:杨志友

封面设计:李星星*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德州鸿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武城县新城古北路 65 号 邮政编码:253000)

开本:880mm×1 230mm 1/32

印张:10.25 字数:175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4-6028879)

自序

读书时代牢记老师们的教诲：记者是杂家。读书真杂，还爱做梦。时而梦想当小说家，早年见闻是第一手素材；时而梦想当历史学家，新闻是史料。多年后重温旧梦，更能理解王国维的诗句：“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

从事媒体工作，我常想起“工夫在诗外”的古训。采访过许多人物以后，我有时静下来细想：以前读过的杂书，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我的访问生涯。心仪的作者，古人只能神往，今人则可欣然拜访，而言语投机的受访者，更有长久的交游。也许，这是当记者得天独厚的益处。不过，我常感自己的短处是杂读而无所成，在求知路上难以精专而后贯通。当网络发达以后，只要输入一个关键词就跳出无数的信息，采访前的准备变得相当方便。然而，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在茫茫的信息海洋里，探求“思想”有时竟如海底捞针。因此，在越来越无纸化的时代，我不合时宜地觉得一卷在手仍是快事。只是在房价越来越高的都市，藏书已成烦心事。

我出道以来亲历新媒体风起云涌，“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

客,眼看他楼塌了”是江湖常态。不管形式如何创新,我始终相信媒体是“公器”,寻找真相的传统不能断,关心弱小的道义不可绝。而有幸目睹势利关头的人生百态,我不免对人性感到悲观。有一次看到胡适写的条幅“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我莫名感动,这不正是当年立志从事媒体工作的理想吗?这一天理使我重新乐观起来。

如果以我出生的1976年为界,中国社会三十多年来正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物质生活的巨变更是我童年时所不敢想象。而我们的思想究竟比一百年前进步了多少呢?我们时代的思想者如何思考“世界之中国”的国运与民生,是我念兹在兹的问题。因此,本书将余英时和金耀基二位先生对辛亥百年的思考作为开头两篇,略有破题之意。而诸位先生的生活与思想,可视为同一时代的多元答卷。

现代都市虽有诸多便利,但我偶尔会惘然若失:身边的朋友好像越来越忙,从容地聊天渐渐成了一种奢望。偏偏多年的经验使我相信:聊天中常常会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而聊天的空间往往蕴藏着一种莫名的“气场”。王羲之《兰亭集序》和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的良辰美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陈之藩《剑河倒影》和金耀基《海德堡语丝》的赏心乐事,则是西方大学自由风气的典范。时代如此巨变,人生如此奔波,道义如此艰难,真不知几时回去,做个闲人,看云听雨。我一相情愿地将访谈当作聊天。忙里偷闲一席谈,已是难得的因缘。希望这本书成为一个独特的载体,将天南海北的畅谈汇聚成一股温润之气。

李怀宇 序于悠然居

2012年7月

目录

自序	1
余英时	
开启共和之梦	001
金耀基	
中国现代化文明的转型	015
李欧梵	
我扮演一个杂学的角色	027
陈平原	
时代转折成就人才	045
何莫邪	
我是世界公民	065
刘荒田	
乡愁是对中国文化的依恋	077
吴中杰	
反思历史人物的命运	095
李辉	
重现惊心动魄的历史	117

刘绪贻	
大学是追求和维护真理的地方	143
吴灏	
绘画与文学就像两姐妹	155
吴宏一	
文学有家国之悲与身世之感	177
潘耀明	
自由是文化之魂	189
蔡澜	
我的正业是玩	205
陶杰	
人格分裂是我的本事	217
也斯	
尝试为中国诗人重新定位	233
夏伯嘉	
追索中国与西方的对话	255
董启章	
整个世界都是小说	269
杨锦麟	
不断寻找新的事业气场	281
梁文道	
我只在乎是否尽到责任	293
周保松	
探求自由和平等	303

余英时

开启共和之梦

(摄影:李怀宇)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著有《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朱熹的历史世界》、《重寻胡适历程》等。

2011年在我个人心灵史上是颇不平静的一年。世事无常,人心变幻,家国多事,各种思想在脑海冲浪。这一年,我和余英时先生越洋通话甚密,余先生总为我解惑。正式发表的“公共话题”则是关于辛亥革命。国人仿佛有“百年情结”,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媒体同行的纪念专题铺天盖地,当中自然不乏借百年老酒杯浇新时代块垒。而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向余英时和金耀基二位先生请教。

余英时很早就研究“革命”。1953年10月20日,余英时在香港为《民主革命论》一书写的代序开头就说:“近百年来我们一直沉浮在革命的浪潮之中。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光明的时代,这是黑暗的时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这,走向天堂;这,步往地狱!’而我则从怀疑革命,憎恶革命,转而开始了我对革命的研究。”完成这本书的时候,余英时二十三岁,其文笔之成熟让我心折,而思想之深刻,至今读来仍不过时。

有一次,我跟余先生说,陈之藩先生写《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时,也只有二十二三岁,其思想上的先知先觉让我惊讶。当整个时代的风气变换时,陈之藩已经对“革命”看得十分透彻。后来的历史一一证实了陈之藩的看法。惊涛骇浪的席卷之下,“不信流血革命,不

信急功近利,不信凭空掉下馅饼,不信地上忽现天堂,只信一点一滴的、一尺一寸的进步与改造”,正是胡适、陈之藩、余英时的共识。

当年余英时在《民主革命论》中认为革命的第一重精神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如范仲淹所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亭林则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余英时特别指出:“革命不是少数人出风头的事,不是一群人表现雄才大略的事,不是‘彼可取而代之’的事,不是杀人放火的事,不是你打倒我、我打倒你的事,也不是这个阶级消灭那个阶级的事,它是全面社会的重建,整个文明的改造,和普遍福利的增进。”

而今回首百年,余英时认为辛亥革命是晚清政府不愿改革的结果。辛亥革命并不是暴力革命,没有流太多血,共和制度向前跨进了一步。中国人要做共和之梦,但是辛亥革命之后有一些国内外的恶势力,把这个梦想挡住了。这些恶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置老百姓于不顾。然而,中国的民间社会在慢慢往前走,文化思想界有了宽松自由的空气。

从历史来看,民国自有许多乱象。但是在中国思想史上,民初的文化界仿佛天才成群而来,所谓“民国风度”至今为一些人津津乐道,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我看来,余英时先生是一位具有旧派风度的现代学者,笔下深含温情和理解,对世界的关怀与思考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李怀宇: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余英时: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戊戌政变,光绪皇帝听了康有为这些汉人的话,要进行改革,要夺慈禧太后的权,这是使她伤心欲

绝的,她从此就防止把权力交给汉人。所以,清政府在戊戌政变以后,越来越控制政权,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要“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国”。满人不能放弃政权的观念一直到1908年慈禧太后死也没改变,权力都是集中在满人手上,他们对袁世凯也不放心。袁世凯到后来是告老回乡。武昌首义发生以后,清政府收拾不了,因为军队听袁世凯的话,不得不招他回来。我认为满汉的界线到晚清更厉害了,政府不肯改革,立宪也一再拖延。那时候大家已经不耐烦了,不能等清政府改革了。康梁是保皇的,但是反慈禧的,问题就来了,满人对汉人越来越怕,到最后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大。早期的孙中山还给李鸿章写过信,那时候不是主张要革命,是要改革的。辛亥革命是满人一再拒绝改革逼出来的。

我常常说,清廷等于一个党一样,内务府就等于党的总部。到晚年,政府要抓权,不肯放松,这样子矛盾越来越大了,当然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高,到最后就没有办法调和了。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很多,把皇帝去掉,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君主立宪的人慢慢动摇了,因为慈禧抓住大权不肯放松。这不是导致辛亥革命唯一的原因,但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康有为、梁启超后来在日本辩论不过孙中山领导的汪精卫等人,汉人的民族仇恨的回忆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回来了,两边各走极端,非革命不可了。不过,那时候的革命也不像后来的革命,组织并不是很严密,多少要靠地下的秘密社会的组织。秘密社会是孙中山想利用的,发动军人仇满,不愿给满人效忠了。后来黎元洪被逼参加革命,也是这样的道理。

李怀宇:在1911年以前,中国人有没有共和的梦想?

余英时:很少人有这样的想法。从另外一方面讲,康有为也提出过

“共和”、“民主”的名字,还有香港一些政论家像郑观应,主要是受西方的影响。“共和”是老名词,本来周朝就有“共和”的说法,指厉王出奔,由两个贵族领袖共同执政。虽然不是现在的共和,但是有共和观念。

李怀宇:1911年发生武昌首义,是不是有偶然性?

余英时:当然有偶然性,革命党暗地里在军队中找同情的人。本来有一个计划,被揭发出来了,提早了。当然辛亥革命之前有好多事件,最有名的就是广州的黄花岗起义,那是很震动人心的一次,像林觉民的《与妻书》是感动很多人的,发生了意外的宣传效果。人的正义感是不能消灭的,总有人要奋不顾身,这是很奇妙的。

李怀宇:当时同盟会在武昌首义所起的作用有多大?

余英时:同盟会里孙中山跟黄兴又分开了,孙中山那时在美国捐钱,武昌事变爆发以后,才赶回来。而黄兴先去了武汉,但是没有成功,他自己没有足够的军队,还是要靠黎元洪带的一批新军。那时候袁世凯有最雄厚的军事力量,他上来以后,革命军是打不过的,但是袁世凯想消灭革命军也很难。那时候因为光绪已经死了,君主立宪没有办法号召了,而袁世凯就想借此机会抓权了,所以先是让他来扑灭革命军,后是让他为两边主持和议,让皇帝和平退位。辛亥革命没有流好多血,不像法国大革命,也不像俄国革命,甚至不像国民党的北伐革命。基本上是体制忽然就更换了,所谓的天子是三岁登基的宣统,不可能号召起国人向他尽忠的心理,如果光绪还活着,可能有这样的号召力。

李怀宇:从历史来看,当时晚清政府已如大厦将倾,弱到不能延续下去吗?

余英时:没有办法了。当然清政府还有一些军队力量,但是不大,经

过了两百多年,权力已经基本上到了汉人士大夫手上。清朝的八旗制度也没有了,靠的是打太平天国的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尤其是淮军。李鸿章的军事力量摆在那里,清廷没有什么办法。

李怀宇:为什么在晚清政府里没有办法进行政治体制上的改革?

余英时:如果谈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当然有许多改革。废科举是没有办法,因为科举毫无用处了,念八股怎么跟外国人打交道?废科举是很有限的,因为新学制度已经起来了,而到日本的留学生多得不得了。当然也有许多人恨死废科举了,但是那些人不是在政治上有作用的人。在我看来,那只是行政的改革,不是政治的改革,没有影响清廷帝王的体制。不肯改革,那是因为利益所在。满人不肯放弃王朝,爱新觉罗是统治的家族,这个家族不肯丢掉权力,到最后逼不得已才让步。我认为,晚清在戊戌政变以后,谈不上有改革,谈不上有什么“新政”。满洲人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流泪的。如果清廷专政不能动,权力没有制衡,那就谈不上改革了。根本的办法是用武力镇压,如果这个办法能够维持下去,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历史可言了。

李怀宇:在20世纪之初,国人在改革与革命上的思想准备足够吗?

余英时:思想不是一面倒的。当时主要是康梁跟孙中山打对台,思想战场主要是在东京,然后才传回中国来。越来越多的人主张革命,因为改良派主张君主立宪,没有君主可立嘛,这是关键。康梁在光绪死了以后就没有借口了,当然,他们是恨慈禧,也恨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有告密的可能,所以后来袁世凯组阁的时候,想请梁启超,梁启超不肯来。最激烈的搞排满革命的人就是章太炎。后来,有些人像王国维始终还是要君主立宪的,他的辫子都不肯剪。

李怀宇:当时外来的思想,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英国的君主立宪,对中国的思想冲击有多大?

余英时:那是相当大的。日本维新的主要人物伊藤博文到中国来鼓吹,而且希望说服慈禧太后,都没有用。但是一般人是相信,明治维新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康有为他们就利用这个东西刺激光绪皇帝。所以,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英国的君主立宪,是鼓励清廷的两个例子。英国的君主立宪早于中国,日本的明治维新跟中国的洋务运动差不多同时。很多人愿意相信走改革的路,没有多少人愿意搞暴力革命的。

李怀宇:在辛亥革命之后,到北伐胜利之前,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等,中国政治处于相当动荡的局面,为什么会这样?

余英时:根本没有一个政治中心,也没有一个领袖能够号召。孙中山虽然在广州,但势力很小。主要政治势力还是在北京,还是袁世凯留下来的遗产。袁世凯死了之后,冯国璋也罢,段祺瑞也罢,黎元洪、徐世昌都做过总统,都不能变成全国接受的领袖。而且,多多少少地方上自己发展了,所谓军阀是拥有十万八万兵,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各省自己发展起来。

我们不要看政治,要看社会上,尤其是南方,像上海、苏州、杭州一带,都是地方上自己发展。最重要的是教育的发展,新学校的成立,还有地方议会的出现。在袁世凯那方面,最早的国会还是有作用的,否则袁世凯就不必搞暗杀宋教仁,因为在国会争选举他争不过。

李怀宇: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对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余英时:没有好大影响。因为本来中国就是天高皇帝远,皇帝势力到县一级就为止,下边是老百姓靠些地方绅士、宗族制度来维持

秩序。组织是很松散的,就是靠儒家以及佛教、道教的一些观念。大家不敢胡来,但不是靠武力。中国农村也没有警察,多半靠宗族制度。我们的乡间恐怕很少变化,至少我在乡下住的那几年,民国政府没有把乡下变好,也没有变坏,还是靠宗族的力量来维持,还有是非感。国民党也没有到我们乡下,还是靠读书明理的人起作用的,所以也没有太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基本上有一个秩序,也不用怕。我在乡下八年,没有见过武力,没一个土匪来抢我们,有一阵子好像后山有土匪想动手,过几天军队来了,土匪也不敢动了。换句话讲,乡下还可以过日子,没有欺负人到不能忍受的程度。

李怀宇:辛亥革命之后,天子的观念还存在吗?

余英时:还有许多人在等真命天子出现。因为中国天子、皇帝的观念是很神秘的东西,不知道怎么来的:一个人怎么能做皇帝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老天爷指派下来的。这是周朝人的观念,一直到20世纪,多少人都相信天命所归。朝代替换的心理习惯不容易一下子改变。老百姓常常希望有一个秩序:有一个朝廷,朝廷上面有一个天子压得住。这样大家才有安全感,也不一定是拥护皇帝,是为自己的安全着想,是感觉强人可以给人一种安定的生活。

李怀宇:当时虽然有人口头上讲法治的观念,但是很难深入人心?

余英时:法治观念非常淡薄,虽然有“法”,但不是法治,是“王法”,要遵守“王法”,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李怀宇:为什么辛亥之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会走得如此曲折?

余英时:现代化不光是政治问题,现代化牵涉到社会经济组织等方面,不是政权在谁手上就现代化了。我认为当时现代化的各方面都没有成熟,中国人还是靠私人关系,而不是靠某一种制度,或某

一种法律,甚至于市场制度。中国人要靠政治势力,有关系,就有办法。靠关系都是自己的亲戚朋友,不是讲公平。过去的中国还有一个科举制度,是客观考出来的,不管中间有多少毛病,但是考试的时候基本上是公平的。农家的子弟一夜之间也可以成为进士出身了。民国没有了,都是靠党的关系,中国的朋党制度成为政治上的党派,就是一群人组成一个团体,打一个现代的号召,好像是有一个原则,其实是次要的,只是夺权的借口。这是中国人的心理状态还没有改变。

在辛亥革命以后,大家又不满意新的现实,又想用更积极的办法去改造中国。这是我们的毛病,老想照一种理想,用一个主义去改造中国,事实上,社会是不允许这样搞的。最好是不要有这个念头:要重新改造中国社会。要让民间老百姓自己发展,少干预,只要民间的发展不会影响整个秩序,就要宽容,给予自由。另外一个关键,日本的侵略是我们一切灾难的开始。辛亥革命本身是往前走了一步,打开了某一些门户。但是我们走出来就有问题,因为还有外面的影响。中国要做共和之梦,但是有一些很恶的势力,或者是国外,或者是国内,把这个梦想挡住了。这些恶势力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置老百姓和全社会于不顾。

李怀宇:孙中山制定了建国方略,终其一生,有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

余英时:当然没有实现。不过,如果没有孙中山提倡革命,很难想象皇帝制度能一下子去掉。共和制度本身是向前跨进一步,皇帝制度没有了,到底还是不同。袁世凯当总统之后,有皇帝的权力,到底不是真皇帝,后来他想做皇帝,改变机制,也改不过来了,没有人吹捧他。天命观念的神秘性也没有了。这是孙中山提倡西方